



说“边疆”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6)02-0083-11

●王铭铭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A

“边疆”由两个原与西文词一样有完整意义的字组成。其中，“边”指物体的外缘，及空间或时间的临界境况；“疆”表示用弓来标志步以丈量土地，可引申出止境、边界、疆域等意义。

合二为一的“边疆”之所指，原与上古天下内部之“国”的定义有关，具体当指与近代国际关系近似的列国体系的疆界划分。^①这个词当时已泛指我们当下理解的“边境之地”、“靠近国界的领土”。^②然而，“边疆”之意象，又运用于区分内服和外服。内服（一般指王畿）与外服（一般指诸藩），是比较而论的，二者内部都有更细致的区分，内还可以有内，外还可以有外，而且，内外之间存在离心和向心的双向运动，诸藩可以变化为“熟藩”，内服可以为外服所“化”，政治上，二者的角色甚至可以互换。另外，内外区分，从来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格局，而持续以四周环绕中心的、动态的地理—宇宙论指“五方格局”（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为表现方式。故而，所谓“边疆”，意味着天下世界里中国与邻邦或藩属之间的疆界，但这些疆

① 徐传保.先秦国际法之遗迹[M].上海:中国科学公司,1931.

② 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1-4.

界,是多层次的“缓冲区”。^①

秦以后,中国历史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两度历史大循环:“第一个大循环是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第二个大循环是从隋、唐的统一到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统一。”^②在统一时期与分裂时期,“边疆”的意义有不同,统一时期,内服与外服观念趋向于占主流地位,而在分裂时期,同是源于上古的“国”的观念则成为核心。不过,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内服、外服及“国”等概念总是同时并存的,“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交互往来、迁徙流动、混杂融合,既向来没有间断过,又向来没有彻底消除“夷夏”之分。^③

二

古老的“边疆”一词,与外文 margins(边际)意思相通,其在政治地理上的特指,则又与近代 boundaries、frontiers、borders 三概念相近。因此,自清中后期以来,这个词常被用来翻译与之对应的那些外来概念。

“边疆”一词举一反三,用起来效率很高,却明显可致使概念模糊化,以之传递 boundaries、frontiers、borders 三个外文词的意义,易于“以讹传讹”。在解译 boundaries 时,汉语词“边界”是一个广为接受的妥当表达。然而,认为“边疆”具有 boundaries、frontiers、borders 诸含义,或者,如我们习惯做的那样,以之翻译后者,却存在用一个汉语词“消化”那三个外文词之间本有区别的可能。

在国内一般文史与社会科学解译中, boundaries 与其他两个词的区分是易于确定的,这个词通常被译为“边界”、“界线”、“界限”;但 frontiers 与 borders 通常没有得到清晰的分别表达,两个不同的词通常被译为一个单一的词——“边疆”。

三

上个世纪 80 年代,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为我们清晰区分了 frontiers 与 borders 的语义。这位杰出的社会学家替我们指出:“在政治地理学中, frontiers 一词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具体界分;另一种意思是指一个国家之内有人定居地区与无人居住地区的界分。”^④ borders 不同于 frontiers,指的是用以分割和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地理上划出的界线, frontiers 则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内部核心地区之外的偏远地带,它可以细分为“初次定居 frontiers”与“二次定居 frontiers”,前者指“一个国家向外拓殖到无人居住或为部落社区居住的地域”,后者指“一国之内,由于土地贫瘠或地形险恶而人居稀少

① 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C]载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8-28.

② 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简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30.

③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21-151.

④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5 p.49.



的地方”。^①然而，“在所有的用法中，‘frontiers’指一国之边缘地区中心政治权威分布稀薄的区域”；与此不同，“在 borders 区域居住的人群可能且时常显示出‘混合’的社会与政治特征，但这些有着混合特征的群体，分别受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的行政支配。”^②

frontiers 指中心向外面过渡中形成的、中心所企及却不能彻底抵达的远处，其合适的译法，当为“前沿”、“边陲”或“前线”，与汉语边疆、边缘或边地意义相通。而 borders 则不是指从中心向外拓展的“前沿”、“边陲”或“前线”，而是指将其所圈定的整个实体“镶围在内”的“边”。这个词既可是名词，指边、镶边、边界，又可是动词，指“沿……的边”、“环绕……”、“给……镶边”，或者指“与……接界”、“在……的边上”。其中，“给……镶边”这个意思最生动——相比于 frontiers 这个具有由内而外推展含义的词而言，borders 确实指在两个以上政体之间的边界线上给这些政体“镶边”的意思。

frontiers 与 borders 之间的区分除了上述几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 frontiers 实指地域广大的地带或带状区域，那里，自然地理面貌受到的人为干预较少，无论是定居人群还是流动人口，都较少受到国家政治中心的直接监管，保留有较强的自主性；borders 通常则是指一条区分内外的明确界限，而非区域，因此，倘若 borders 要获得接近于 frontiers 的意思，通常需要加上 lands，而成 borderlands 或“边区”。

在对含义有别的 frontiers 与 borders 加以语义辨析时，社会学家一般怀有将现代性界定为“后传统(post-traditional)时代”的目的。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吉登斯认为，这两个词所代表的两种“国界边缘”(border margins)形态，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产物。frontiers 广泛存在于不同的传统国家中，但 borders 则是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的特定产物。前者多与帝国相关，具有常变形、扩张性、非主权性，后者则只存在于民族国家时代，具有稳定性、内敛性、主权性。尽管罗马帝国与古代中国都建立了边墙，但这些边墙并不具有现代 borders 的性质，而依旧属于中央权威管控之外的 frontiers，绝非现代国家主权的地理限度。相比而言，虽然现代国家的 borders 可能与自然屏障对应，但自然屏障绝非 borders 的本质。一言以蔽之，“borders 除了是为了区分国家主权而划出的线条之外，什么都不是”。^③

无疑，frontiers 与 borders，都是 boundaries；然而，boundaries 不等同于 frontiers 或 borders。个中原因是 frontiers 与 borders 是指有时代和政治地理特殊性的 boundaries。

如前面提到的，boundaries 一般译为“界线”（强调其区分的线条，有时加 lines，成 boundary-lines）或“界限”（强调界线涵括的事物的“限度”），常用以指事物的边缘、边线，不同事物之间的“区隔”或两个地区之间划分边界的线。在社会研究中，boundaries 所指，伸缩性极强，小到区分个体之“人身”与其“外界”之间自然或人为区分的“面”，^④大到大规模帝国的 frontiers，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变数，包括“镶嵌”人类居所空间的帐篷或围墙所构成的界线，由一批居所形成的“共同体”与其外界之间的界线，阶层或阶级的界线，地方和区域之间的界线，为行政而设的地理界线，市场或庙宇覆盖面之间的界线，族群之间的界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总之，虽然我们习惯于将“边疆”对应于 boundaries、frontiers、borders 等词，但是后面这三

^{①②③}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p.49-51.

^④ 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43.

个外文词之所指差异相当大,我们难以将之统一翻译为“边疆”,而需要给它们不同的对译词。大致上, boundaries 可译为界线、界限、边缘、边线、边界, frontiers 可译为前线、前沿、边陲、边疆, borders 则基本只可译为国界或边境。以我们此处关注的“边疆”而论,这三个单词应分别指边缘/界限、边疆/前沿与国界/边境,其对应性可表示如下:

Boundaries \approx 边缘/边界 Frontiers \approx 边疆/前沿 Borders \approx 国界/边境

四

社会学家侧重考察边疆/前沿与国界/边境的区分,及二者之间的前后断裂。他们既认为,边疆/前沿与国界/边境,一个属于“传统社会”,一个属于“现代社会”,又认为,边疆/前沿向国界/边境的过渡,是“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核心内容之一。倘若我们拓展历史视野,那么将能看到,所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均属于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国家,而所谓边疆/前沿与国界/边境,正是这两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国家的边缘/边界。

19世纪以来,接续某个启蒙运动流派的思想传统,不少人类学家将社会学家所谓的“传统社会”与“原始社会”加以对比。他们认为,史前人类社会,以人身关系为基础而形成,这类社会至今依旧存在,它们同那些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或“国家”,有着鲜明的区分。^①这些以人身关系为基础构成的非政治社会,有边缘/边界,包含内部的差序,也包含区分社会共同体内外的边缘/边界,但没有后来的边疆/前沿、国界/边境,因为,边疆/前沿、国界/边境是国家时代的边缘/边界,是“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政治社会”或“国家”的特性。

有保留地借用人类学的既有论述,以之丰富社会学的传统与现代二分法,可以对 boundaries、frontiers 及 borders 的历史作另一番叙述。这叙述的轮廓大体为:作为广义的“界线”, boundaries(边界/边缘)历史最为久远,范畴最为广泛,可把 frontiers(边疆/前线)和 borders(国界/边境)包括在内,其历史以万年计, frontiers(边疆/前线)具有空间伸缩的含义,其动态持恒绵延,是“传统政治社会”的边界,历史以千年计, borders(国界/边境)是近代的概念,是民族国家时代的政治地理范畴,属于“现代政治社会”的边界,历史以百年计。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了边缘/边界,这些线条存在于人人之间、人物之间、人神之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法。最早的人群,不是一些人类学家想象的平等社会,而很可能是平等与不平等杂糅的。^②那些人群的活动规律,应合冬夏二分的季节区分:冬季人类形成规模相对大的共同体,共处一屋,夏季分散活动,冬季有相对固定的居所,夏季流动性极强。那时的“边界状况”与人们的“生计方式”相应。可以猜想,在冬季,人们形成较大共同体,其边界需要加以相对明确的定义,而在夏季,人们成为“漫游者”。^③当时的农牧业均未发育,与

① 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

② David Wengrow and David Graeber, “Farewell to the ‘Childhood of Man’: Ritual, Seasonality,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1(3): 597-619, 2015.

③ 莫斯,伯夏.论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C]//莫斯著,余碧平



农耕习惯紧密相关的“疆”的感觉亦未出现,人们无需瓜分田地牧场,而只需仰赖自然的供给即可生活,因此,边缘/边界不固定,反倒是那些穿越界线/边界的行动最绵延持恒。

过去一万年来,人类给自己及其生活的这个世界设置了越来越多的边界,这些边界随之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实质性力量。

人类驯化了动植物之后,个别狩猎—采集群体持续在边缘地区生存了下来,但多数社会共同体变成了农民和牧民。农民和牧民赖以生存的产品不同,前者的是种植于土地上、不能行走的植物,后者的是活动在土地上、能够行走的动物。由是,农民和牧民对于栖居的要求不同,前者不同程度上应与其生活所仰赖的“农产品”一同定居,而后者,则“逐水草而居”,流动性较强。不过,相比于此前的群体,农牧时代的人,多数已有栖居者的本质,定居和居无定所的区分,不过是程度上的。这些栖居者一旦有了自己的家园,便要求圈定聚落的范围,为了“过日子”,而设置出空前清晰而有力的边界。这些边界包括在家、牧场/农园、“野地”之间存在的线条,也包括在聚落与聚落之间自然存在或人为制造的围墙,更包括从“漫游者”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季节、时间、性别、年龄、生死、圣俗界线。

边缘/边界的隔离与区分作用在人获得生产自己吃的食物的能力之后得到强化。正是在发生于一万多年前的“农业革命”之后,边缘/边界获得了明确的政治含义,并于距今五千年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演化成区分内外的边疆/前沿。“城市革命”之后,以高度发达的农业为基础,城市脱颖而出,建立了自身与乡村的区分,此后,人类社会被植入了高度复杂的政治结构和生产—交换结构。^①加之文字体系已渐趋完善,一面使扩大化了的共同体内部实现清晰的阶级分化,一面协助共同体拓展存在空间。由内部的阶级分化而实现的政治经济结构复杂化,使经历“城市革命”的共同体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这些强有力的社会与周边部落形成了清晰的文化差异。它们掌握了冶炼技术,发明了金属工具和武器,脱离了“石器时代”,成为有高度生产力和战斗力的“金属社会”。为了防御与扩张,这些社会开始创造出边疆/前沿。

城市革命或文明“起源”的历史,是大社会(帝国)与小共同体之分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边疆/前沿出现,表达这一“大小不一格局”的易变性,即大社会对小共同体的威胁,小共同体的联合及其对大社会的挑战。

边疆/前沿出现于5000年前,与“青铜时代”安全危机意识的诞生、部分人类之侵略性的放大有关。

劳动力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被广泛认为是民族国家成长的几百年最主要的历史动力。然而,正是在人与物自由流动的年代里,绝对化的国界/边境建立了根基。狭义的国界/边境是与民族—国家的“全权式统治”相关联的。民族—国家的“经典版”产生于欧洲,是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在教权与分化的王国王权得到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②这种国家形态为轮流征服世界的近代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提供了有效的政治军事条件,其“先进性”又广为近代社会科学所论证,从而能够顺利地通过“文化传播”而得到被殖民、被征服社会的广泛接受。

译.社会学与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23-396.

① Gordon Childe, “The Urban Revolution”, *Town Planning Review*, 21(1):3-17, 1950.

②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p.83-121.

民族国家时代,政治空前集中于由暴力武器的国家垄断而促成的国内绥靖与国际战争。长治久安成为国家的理想,为此,通过高度技术化的监控和高度历史化的民族归属感创造,消除内部分歧和风险,实现国内道德意识的一体化,通过军事的垄断,清除暴乱的可能性,成为国家的使命。国界/边境在这个时代的出现,既与此时世界性的“战国情景”紧密相关,又与民族—国家追求内部安全的渴望互为因果。我们之所以可以把民族国家时代称为“世界性的战国时代”^①,是因为,与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相近,民族国家视野下的世界体系是国家之间契约(牵扯到“平等”的概念)关系的体系,也是国家之间战争的体系,在这个时代,国界/边境成为近代以来最敏感的神经,因此,其穿越牵引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其形塑(社会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宗教性的)既耗费了人类的最多人力与物力,又是现代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

五

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 boundaries 向 frontiers、frontiers 向 borders 过渡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社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清晰,维持这条“群分”之线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些线越来越政治化、军事化、固定化,最终成为民族—国家神圣性和安全感的源泉。

然而,疆界强化史不能独自展开,而只可能同与之共同汇入整体历史之河的另一条支流同时流淌。

疆界的强化史这条支流,似乎可以用“疆界力量的进化”来形容,含有几个清晰可辨的阶段。而那另一条支流,则相反,不同于“疆界力量的进化”,这条支流持续表现着其冲破阶段、将界限转化为通道的力量。

界线不只是为区分而设,而且也是为其自身的穿越而设。自从人类开始区分事物,他们便同时开始依赖区分而达致“会通”。最早的人类生活在人少物多的世界里,他们凭借着对万物呈现于眼前的时间规律来区分和界定季节与时间,借助着自然的“本能”划分男女老幼,依靠着对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永恒的感知划分世俗与神圣。与此同时,他们沿着其所划出的界线,开凿出条条通道,联结人文与自然,合成群体,使用日常和神异的力量,借助巫术与仪式,穿行于界线/边界内外,实现生活和信仰的通达,将人与万物的距离转化为人与万物的交流。

自人类开始生产他们的食品之后,人与自然界之间加入了一个“驯化”地带,如农园、牧场,它们都具有深刻的中介含义,模棱两可地位居主体与客体之间,使世界“三重化”为家、农园/牧场、“野”。家之外的农园/牧场,似乎是一条自然的界线,或者说,似乎是一条自然的边疆/前沿,一面表达着文野之别,一面沟通二者,“文质彬彬”,使“野”的“文明化”、人的“物化”和“神化”、神的“人格化”成为可能。

与相邻或遥远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随着“产权意识”的兴起,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界线空前清晰化起来。然而,这些界线的出现未能改变一个命定的事实:社会共同体自身的延续,仰赖的是其与其他社会共同体的“交际”——倘若没有这种“交际”,那对于社会共同体的生存有着关键价值的生育,便无以为继。

边疆/前沿可以指史前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的中间地带,严格而言,则与由农业的盈余

^①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67-175.



而滋生出来的城市和国家紧密相关。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致力于相关研究的学者多倾向于认为，20世纪国界/边境对民族国家起过重要作用，但临近21世纪，由于经济、环境、政治和社会诸领域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国界/边境之内，而与超越国界的流动性越来越相关，因此，国界/边境不再有此前的地位。^①

这一将过去与现在二分的观点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但它是对历史的误断。

界线的流动性含义，自古深刻。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是长城。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指出的，长城似乎是世上最绝对化的边界之一，长城内外存在气候、植被、农耕/游牧、种族、语言、宗教、政治以至种族差别，而中国的国家利益似乎也需要一个固定的边疆，以此来区分夷夏。但是，无论是汉人中的一些人(如商人)，还是处在长城过渡带的“夷狄”，都仰赖边疆划分出来的内外生活着，如此一来，绝对固定的边疆“永远不能完全实现”^②，“交流既然不能完全切断，就必须使他们尽可能地有利于中国，而不是从中国吸走财富和实力”。于是，“两种基本的势力在影响着这个边疆。汉族本身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像他们的政治力量一样，越过长城而发散到草原上去。在那一边，已经发展其本身独立潜力的草原，也开始发挥其影响力，对抗汉族的势力。在这两个基本势力的冲突的基础上，又产生次级势力，对基本势力的活动产生影响，并使其更复杂化。”^③

与长城这条“边疆”一样，国界/边境向来既是区分的界线，又是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过渡地带。

封闭与交流是任何历史阶段的双重特征，民族国家不是例外。我们有理由将民族国家的国界/边境视作绝对化的边界，但在民族国家时代，有严格疆域界定的社会实体，时常以疆界之外的启迪来“升华”自身。国界/边境将民族国家圈成一个容纳公民的“容器”，作为“容器”，它给予社会一个固化的外壳。然而，民族国家的发达，正是基于跨越国界/边境的文明借鉴而得以实现的。与此同时，如近代欧洲历史经验所表明的，技术借鉴成功的民族国家，往往更易帝国化，而所谓帝国化，也就是从军事、政治经济、文明势力上，穿越自身“神圣领土”，或与他国结为同盟，或化他国为本国的边疆，由此转身，复兴前现代边疆/前沿的传统。^④

与“边”字有关的三个范畴，指向社会共同体从交流走向封闭的历史方向，但这一方向存在着自我否定的潜力。

六

近代国族政治经济学世界观传入中国之前，正史“四裔传”^⑤已有关于“边疆”的系统记

^① Hasting Donnan and Thomas Wilson, *Borders: Frontiers of Identity, Nation, and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54-155.

^{②③}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73.475.

^④ Marcel Mauss, *Techniques, Technology, and Civilisation*, Oxford: Durkheim Press/Berghahn Books, 2006, pp.35-40.

^⑤ 王文光，仇学琴.《史记》四裔传与秦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J].思想战线，2008，

述。在这些记述里，“边疆”含义约等于西文的 frontiers，系指王国区分内外的界线，分布在天下世界外围的山川、群体和“另类王国”及边缘地区中心政治权威分布稀薄的区域。这一界线有一定的政治性和军事性，在某些时期相对固定，但其通常的特征是变动不居，在若干重要时期，甚至彻底冲破藩篱，演化为“四裔”与中心政治权威的族性关系倒置。作为对中心—边缘关系倒置的反应，历史上多次出现“夷夏之辨”论争，而近代以来，这类论争则以“危险的边疆”（如帝制时期的“长城以外”及鸦片战争之后的沿海）这一新意象得到新演绎。

现代中国疆域，范围基本形成于清代，但这一疆域不完全等同于清代的形态。在清代，“疆域”内除了 22 个省，尚有四方藩属，而诸土司区域（如甘青、西南），虽已改土归流，但其“间接统治”的事实并未彻底改变，使清之“疆域”有别于民族国家时代的“领土”。此外，清中期以后直到 20 世纪中期，中国周边，内陆（如俄罗斯）帝国和海洋（东西洋）帝国兴起，“夺我藩属，割我土地，租我良港”^①诸事相继发生，使清朝之原本疆域出现了变化。

20 世纪上半叶，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而替代边疆的国界观念却既已得到接受。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大量“边疆”和“疆域”沿革论述兴起于言论领域，这些论述以国界概念回溯国家的过去边疆，以绝对化的内外界线来区分“中外”，承认“天下”是万国之一，接受在国界之外居住的人群归属于他国的事实。但吊诡的是，诸多“边疆”和“疆域”沿革论述又需依据史实而得出有关“边疆”的动态结论，这就致使 20 世纪上半叶的“边疆”论述具有双重含义。“政治上的边疆”成为国人用以区分内外的标准。“政治上的边疆”，指有清晰政治地理界定的国界，包含陆界和海界，实质等同于国与国之间标识和捍卫其领土主权之区别的“国防线”。这一“国防线”的概念，与历史上的“塞外”、“域外”、“关外”概念重新恢复了观念关系，成为前后相续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边疆”和“疆域”的论述，却又保留了“文化上的边疆”的关怀。“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②，这类“边疆”，是指中国与外国毗邻之地区与“中国民族”的“我群”文化上有差异的“他群”。“政治上的边疆”与“文化上的边疆”出现在有关“边疆”的不同论述之内，作为这些言论的杂糅内容存在。

围绕着“边疆”的政治性与文化性问题，学界和政界长期存在分歧，一派主张为捍卫“政治上的边疆”而淡化“文化上的边疆”之与“我群”的差异，一派主张承认以至捍卫这一差异。

20 世纪 30 年代末，围绕着要不要守护“文化上的边疆”这一问题，学界出现过具有范型含义的论战。吴文藻等主张，边疆地区民族、宗教、语言、文字、经济、文化各异，现代文化建设应“铲除各民族间相互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来隔阂的感情，亟待在根本上，扶植边地人民，改善边民生活，启发边民知识，阐明‘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晓示‘中华民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真义”。而傅斯年等则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早已合成一体，虽中国境内现仍存在族群性文化差异，但不足影响中国民族的整体性，要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首先要取消“边疆”、“边人”、“边地”、“不开化”、“民族”这些有悖国族统一政治目标的概念，“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③

(4):25-29.

①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22.

②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47.

③ 王炳根.吴文藻与民国时期“民族问题”论战[J].观察与交流,2015,(153).



吴、傅两派之间的分歧,可以说是由论者对“边疆”到底应该是国界还是“前线”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造成的。傅斯年等持国界之说,倾向于认为,为了“政治上的边疆”(区分领土主权之别的“国防线”),将“文化上的边疆”说成是历史上已消弭了的现象;吴文藻等持“前线”之说,倾向于承认“文化上的边疆”(介于中外之间的“民族”)持续在“当下”起作用的事实。

20世纪上半叶,在回溯中国疆域沿革史时,国内史地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心存困惑和矛盾。他们生活在一个前沿/边陲正在固定化为国界的时代,此时,历史的叙述需照顾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在现实世界中立足的需要,而他们研究的“过去”却充满着种种变数。边疆研究依赖的观念资源多与国界有关,但研究者一经与边疆的历史事实接触,便发现,边疆的历史事实是两面的,有些事实与社会之间的区分有关,有些则深刻地与社会之间的联结相关,后者比前者事例更多。作为一个饶有兴味的例证,在其边政学论述中,吴文藻一面借重国界概念,言说国界内领土的固定性,一面将“中华民族之形成史”直接联系到边疆和海外“两路”上“迁徙混合的迹象,移殖屯垦的功绩”,称少数民族所在之地为“有形的边疆”、“国防的最前线”,称华侨所在之地为“无形的边疆”、“国防的最外围”,^①呼吁社会科学研究者重视“御边理藩的积业,开拓疆域的成果”,及“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畜牧文化冲突混合的历程”,重视另一路上海外华侨的“苦力建树”。^②

要把握边疆形成后出现的观念与事实困境,就要理解边疆形成之前以更显然的方式存在的封闭与交流的辩证法。而要理解这一辩证法,就要纠正“以今鉴古”的“社会共同体”内外二分之社会科学认识习惯,“以古鉴今”,重新认识边疆的含义。

“边疆问题”的古今之变,核心进程是政治地理观念形态从三元结构向二元结构的转变。如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早在19世纪末即已指出的,在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如有机体,^③其周边确实由“国界边缘”围绕,但在国家权威中心与邻国边缘区域之间,尚存在兼具界线两边国家社会和政治特征的“自主区”(autonomous zone),这个“自主区”的存在迫使我们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权威中心,都存在核心、中间、外围三个圈子。^④处在中间的“边疆”,是作为政治有机体的国家的动态面。政治化、军事化、固定化如习惯于区分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学家所相信的,拉策尔的这一论断主要是在说明国界诞生之前的边疆情景。^⑤在民族国家时代来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欧洲中心的近代史观而言,以国界为绝对界线区分主权国家之间界线的民族国家政治地理观念,存在前提是带状分布的“自主区”萎缩为线性的、范围狭小的“国防线”,而“国防线”的诞生,必然导致多层次的界线化约为二元对立的内外区分格局。

①②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78.581.

③ 拉策尔对政治地理的理解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边疆”的地理生物学动态论。他认为,国家是成长中的有机体,国界不过是其成长过程中的历史站点。国界的跨度表现民族的健康状态。

④ 关于拉策尔的民族学思想,见戴裔焯.西方民族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58-260;关于其“边疆”理论,见袁剑.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以拉策尔、寇松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2):38-42.

⑤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49.

国内“政治上的边疆”之说,正应合这一“历史潮流”而出现,而“文化上的边疆”之说,则旨在保留拉策尔称为“自主区”的“有机边疆”。前者以近代欧洲民族和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为追求,接受欧洲中心的世界史观,有用民族国家政治地理理想形态界定难以界定的历史的嫌疑,后者则坚持在“本土”历史的存库中寻求多层次界线绵续的资源,旨在以一种更新了的“夷夏之辨”,部分否定17世纪以后欲求得到世界化的欧洲历史标准。两者矛盾相处,但共同表现着现代中国“边疆问题”道路选择的左右为难状况。

然而,如上文勾勒出的历史轮廓所表明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政治地理界线绝对化的历史,内涵并不单纯,结局有悖初衷,即使是在民族国家政治地理观念“征服世界”之后,“边疆”的历史进程依然是在封闭与交流两种势力的交互推动下展开的。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政治上的边疆”与“文化上的边疆”两种说法,只不过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双重特征的话语表达。作为主张,两种说法没有一种完整反映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形,它们因各自附着于内在于这一进程的一方势力而无以表达另一方。

七

“边疆”是中外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近代以来,中外对同一话题的讨论,存在着某种不易廓清的分殊。这些分殊的出现,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语义跨文化扭曲”是其组成部分。尽管中国既有概念“边疆”已被用来翻译包括 borders 在内的相应词语,但它的本来含义相对更接近于 frontiers,而与 borders 之间存在鲜明区别。理解 frontiers 与 borders 之间的区别,就是理解政治地理历史进程本身,而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确如 frontiers 与 borders 两词的区分所意味的,是边界经由古代转化为边疆,边疆经由近代转化为国界的过程。与此同时,虽则 borders 既已在近代史中成为政治地理的主导观念,然而,其所意味的政治化、军事化、固定化主权国家界线,并不全面反映近代政治地理的现实。如同传统社会,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在国与国之间划出清晰界线以区分我他,求取内部绥靖,制造文化认同,一面冲破自设的界限以“走向世界”,实现自我更新,拓展生存空间。政治地理历史进程的内在矛盾,迫使我们承认,尽管 borders 不是 frontiers,但 borders 表达或掩饰的事实与 frontiers 极其靠近。在一定意义上,这意味着,近代以来,汉文“边疆”对 boundaries、frontiers、borders 进行的化讹,虽然含有对所对应的西文概念的曲解,却说明,后者施加的区分,具有扭曲事实的观念形态特性。“边疆”虽更接近于 frontiers 的含义,其所指远非 borders,但正是这个与 borders 意义不同的词,更能说明 borders 时代(亦即民族国家时代)国界的两面性。

重新沉浸于边疆概念的复杂意境之中,对其双重性再度加以诠释,有着高度必要性。与汉文“边疆”一词最可对应的 frontiers,政治地理意味是,区分与联系、封闭与开放同时展开,是有机的政治实体“生活”的地理空间。在有关“三圈说”的相关论述中,我试图将“边疆”重新转述为“中间圈”^①,试图以“中间圈”界定包括政治实体在内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并以之形容作为内外关系纽带的边疆的地域化情景。我将重点放在“中间圈”,是为了表明,正是

^①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王铭铭.三圈说: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社会科学[J].西北民族研究,2013,(1):82-99.



这个分布在周边的地带,界定着政治实体的范围,为它“镶边”,而这条“边”,又常是文化接触最为集中的地带。在边疆或中间地带,区分无法阻止接触,接触不会消减区分,相反,它含有制造区分的机制:一方面,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互动,引发符号与价值的叠合,但另一方面,由这一叠合而引发的文化相似或共通,同时为文化区分的留存提供了基础。^①

致谢: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于2014年9月21日下午应《三联生活周刊》之邀在“思想·广场”活动上讲述过。该活动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举办,我的座谈题目是《边疆的形成》。我要感谢活动组织者、《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舒可文女士的邀请,及“边疆的形成”座谈的参与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关凯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少雄博士——的陪伴。

[收稿日期]2016-03-27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Silk Road-Corridor: Enlightenment from Multi-ethnic Community and Cultural Space——Taking He Huang Hua'er as an Example

Yan Juanying Hao Sumin

Abstract: Nowadays, Hai Dong, Jinghai and Linxia, Gansu, occupy “the golden parts” in the one-belt and one-road, which were called He Zhou and He Hua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farmers and shepherds used to live and work together in these places, and from year to year, in order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hey created Hua'er and Shaonian, the sound part of which were called “Quling”, and the written part of Hua'er and the sound part of Shaonian, as well as the worship of mountain's god, etc, comprised of the multi-level “cultural space”. These activities interacted with each and formed the “inter-ethnic group discourse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of heart. This paper tries to, employing perspective of human geography, and musical anthropology,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elody of music “Zhiling” performed by different singers from Han, Tu, Hui, and Tibetans and helps to investigate how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chieve a common identity by singing these songs. From the One-belt One-road landscape we can see these cultural elements are typical source of enlightenment from our ancestor and through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the multi-cultural relationship and common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singing of these songs.

Key words: Huear; He Huang- He Zhou; soul; merger; enlightenment (see P.119)

^① Frederik Barth, “Introduction” to his edit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Inc., 1969, pp.1-16.